

响彻千古的悲绝之音

——浅谈庄子的生存观

马荟苓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无论是他的日常言行,抑或文字著述,都鲜明地表现出率性认真、不趋世俗的精神品质。但是在庄子看似旷达的生存观背后却隐藏着浓厚的悲剧意识。生逢乱世的他,面对黑暗的现实,内心处有着难以言说的恐惧和失意,于是他选择了顺时安命的妥协,他的“混世哲学”未尝不是一种否定与批判。虽然他企图通过“体道”、“心斋”、“坐忘”,达到“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超越,但是他的生存哲学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精神层面都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和悲剧。

关键词 庄子 悲剧 道 忘 游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4-0078-04

庄子在先秦诸子中总是显得那么特立独行,无论是他的文字著述,还是他的生存方式,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庄子虽认为“死生同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1]“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然而他却仍恋恋于生。正如胡文英所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极冷,故是非不管;心肠极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还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2]庄子冷眼旁观,却又悲情万种,他的一生是充满悲剧性的,而他的《庄子》则是悲剧意识的真实再现,但这悲剧华美而深邃,缠绵而伟岸,是一首融汇力与美、响彻千载的绝唱。

一、生于乱世的恐惧和失意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后期,与宋国末代暴君宋康王同时,当时政治极端黑暗,整个社会充满祸患,无辜者横遭残杀,到处是惨不忍睹的险恶处境。那个时代,诸侯兼并,战乱频繁,正如同时代的孟子所言“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徐无鬼》也说,当时的诸侯是“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庄子是宋国蒙人,当时的国君以暴虐出名,被史书称为桀宋,《史记·宋世家》说他“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人间世》里所说的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正是

对他的写照,庄子正是处于“昏上乱相之间”的社会。他痛斥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下沉浊”的时代。

《人间世》中展示着当时的社会现实:“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能避。”在《在宥》篇中,庄子针对触目惊心的生存环境,怀着极其激愤、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心情,给予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书中描写了不少受过刑的人,如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等等,这些人物也可以看做是“刑戮者相望”这一残酷现实的写照,由此可见当时受过刑的人很多,刑法很严酷。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必然使有知者整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即会丧失性命,一种对人生的恐惧弥漫在他们的心灵;“人之生也,与忧俱生”。

有人认为《庄子》的意义是教给人们怎样享受生活,怎样忘情于世;有人认为庄子是纯粹的出世派,纯粹的虚无主义者,然而事实上并不尽然,他们大概都忽略了庄子内心深处对乱世恐惧绝望的情绪。那个时代,战火不断,朝不保夕,人民生活悲惨,庄子对这样的现实既不可能逃避,也不可能完全超越,却是比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而对庄子的悲剧意识其实古人早已觉察,如成玄英在《庄子疏》中所言:“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非下士之所闻”^[1]。

收稿日期 2009-06-11

作者简介:马荟苓(1984—),女,河北廊坊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① 文中所有《庄子》引文都出自此版本,只注明篇目,不再详注。

庄子的悲剧被掩藏在他汪洋恣肆、逍遥洒脱的文字背后,很少有人能真正领悟到他的哀怨之情,难怪胡文英感叹“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於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2]

在《庄子》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对祸患生命的极度恐惧,而且根据书中零碎的事例及其流露的片言只语,还可以感受到庄子对人生的倍感失意,在世俗间高蹈者的形象背后,庄子又是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外物》);“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螭系履而过魏王”(《山木》)。他常常衣食无着,屡屡乞讨度日,他在妻子死后和自己临终之前所表现出的超乎常人的冷漠、近乎变态的达观,实际上也不可否认地掩映了一种身世的凄凉。险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庄子内心强烈的逆反情绪,但他不愿同任何统治者合作,以至于“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虽曾为漆园吏,但那也是俸禄极低的小官而已,而他作为不事产业的士人既然不肯结交权贵,生活自然就困难。虽然庄子极力挖苦讽刺那些巴结权势的人,可是恐怕那个被他挖苦的曹商所指出的“夫处穷阎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却正是他自己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他一方面是不肯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一方面又找不到摆脱失意处境的现实途径。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庄子只好将自己放在“材与不材之间”,这也算是对失意无望人生的另类调侃,正是这黑暗的现实使得庄子不得不选择避世的生存,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仅免于刑焉”。

二、顺时安命的否定与批判

庄子生于乱世所遭受的恐惧和失意,令他对这个世界十分厌恶,可是越是痛恨这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社会,他却越选择生存于世,甚至是苟活于世。这似乎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悖谬,然而这种看似妥协性的存在于世未尝不是另一种静默的反抗。庄子反复讲论如何“养生”、“安命”以延长寿命,但他内心却又对死亡抱着无所谓的不屑,在这种心态下,他的养生之道与混世哲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同于哀号怒骂的否定与批判。在那个正义与公理都荡然无存的社会,庄子提倡的“无用”、“无为”实际上是拒绝与统治者合作,拒绝为黑暗的世界再添罪恶,于是他选择了顺时安命的生存之道,就如同一个沉默无言的抗议者静坐在广场之中,看似毫无行动,但却独立于世,如此的醒目以至于统治者不能忽视。

在《庄子》内七篇中,始终都围绕着如何“修己”展开,修己就是为了生存。尤其是《养生主》和《人间世》集中讨论如何修身、处世及如何保全自己。“为

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人间世》)

至于如何养生,如何保全自己,除了“缘督以为经”、“县解”之外,庄子还为世人提供了一套“无用”、“无为”的避世哲学。在庄子看来“有用”就是有害,因为“有用”而不能长寿,不能保全,只有“无用”才是大用,不能被人所用才可免于羞辱,可能保身。在庄子的无用哲学背后我们能够体味到一种辛辣的讽刺和深沉的无奈。

可是庄子的不言不行,无用无为的处世哲学在那个时代并不能真正使人们在乱世中“游刃有余”。《人间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权谋狡诈的动乱时代,一部无辜者横遭杀戮的血淋淋的历史。陈鼓应认为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时代。“知识分子凡事要分寸得体,时时要藏智匿才,才能免遭嫉恨陷害。”^[3]可悲的是,这些出自无奈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在激荡不安的乱世里,祸患依旧累累,命运依旧戚戚。有人认为庄子的顺时安命是化解其人生悲剧的方式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游戏人间的处世之道确实是对现实苦难生活的一种逃避性的化解。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种生存方式深处所隐含的批判性,而这样的批判又是带着悲怆孤傲的色彩,这样的生存透着玩世不恭的冷漠。庄子渴望超越现实苦难的方式更重要的不在于此,而是心灵上的逍遥游。

三、精神超越的“乘物以游心”

作为悲剧意识的精神主体,面对失落的时代精神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庄子也曾经徘徊于“出”与“处”的矛盾选择中。在现实层面,庄子选择顺时安命的随俗,实际上是避世的生存,而其所谓避世,如前所述,实缘于愤世嫉俗,因此他的“处”是愤世嫉俗之后修身养性的自觉选择。与一般隐士不同之处,在于他还选择了“游世”,既避世又游世,身处矛盾之中,必然要追求精神解脱,即“乘道德以浮游”(《山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厌倦,对矛盾斗争的反感,使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所以他想逃于“无人之野”,游于“无何有之乡”。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而不知人”,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庄子的独特之处,庄子反对“与人为徒”,追求“与天为徒”,希望割断自己与社会的一切联系,忘却任何人的存在,把自己托付给广大的自然;“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他是“第一个从精神角度寻求人生出路,化解悲剧的思想者”^[4]。他的“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超越是博大宽广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大美”,他没

有囿于人世,而是敞开了宇宙般的胸怀。

庄子渴望逃离现实的苦难,他最终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解放,以建立精神自由的王国,而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如宗教家的廉价构想,求之于天上或未来,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闻道”、“是”、“体道”、“是与天为徒”,是“入于寥天一”。“道”是什么?

《大宗师》里具体论述了“道”的含义:“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道”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感性与情感因素的美学范畴。“道”并不只是纯粹逻辑推导和思维抽象的产物,它“有情有信”有生命,既是高度抽象的,又是感性直观的,是理性与感性结合在一起的。对“道”的追求绝不只是一种知识和理性的探求,而是一种带有浓郁感情色彩、伴随着强烈的感性经验的生命体验。《知北游》中曾说到“体道”,所谓“体”便是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体验,是全身心地沉浸在“道”中,四体不言而喻地感受着“道”,好比轮扁之斫轮,“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却“口不能言”(《天道》)。因此,“体道”与其说是一种认知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命体验与生活方式富于审美的特性,因此“体道”的结果是“得道”;“得道”就是进入了“至美”、“至乐”的境界。

在庄子看来,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整体,不论天地万物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于“道”——终极性的宇宙本原,所以天地万物从本质上讲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正是《庄子》之所以认为生命个体必须与“万物皆一”的思想根源。《庄子》认为现实存在的世界并非始终都如其当时的具体表现一样,在原初的时期,宇宙万物都处在一种“太初”的状态当中,一切事物都是“混沌”地相融在一起,它们的消亡也始终在自然的更迭中进行,世界具有完整性的存在状态;“万物一齐”,并不存在人为的分割及随之而来的区别性对待。因此,庄子才会认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而且还在其所设想“神人”的超脱性存在中寄托了这种理想化的精神诉求,认为“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由此看见《庄子》生命哲学中真正追求和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超越性状态,这正是其在人类个体的现实存在中所寄托的最高的生命理想。

那么如何做到“体道”呢?庄子认为应做到“心斋”和“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

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庄子认为只有“悟道”才能够“外生”——置生死于度外;“外天下”;“忘仁义”;“忘礼乐”。因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无限性和人生的有限性的矛盾,所谓悟道时要“黜聪明”、“去知”,因为功名利禄弄得人精神不得自由,所谓“悟道”时要“外物”、“堕肢体”、“离形”等。“悟道”的过程,就是摆脱一切人生矛盾的过程,而“悟道”的最后结果是“见独”,即领悟到那个无所不在的“道”的存在。领悟了“道”,个体便能与“道”合一,从而进入“无古今”、“不生不死”的境界。

庄子所说的“游”通常都是指精神上、心灵上的“游”,即“游心”,如“游心乎德之和”、“游心于淡”、“游心于物之初”、“游心于无穷”。首先,庄子的“游”是要脱离仁义道德而“游”。《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曰:“而奚来为轶?夫尧既已黜汝以仁义,而剿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涂乎”可见,庄子认为仁义道德好比“黜”、“剿”之刑,是加在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刑罚,人一旦被套上“仁义”的枷锁就“游”不起来了。其次,是要摆脱功名利禄而“游”。就像《逍遥游》提出的“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功”、“无名”才能实现所谓逍遥游。其三,是要舍弃智谋事任而“游”。游就是无所事事,既不劳力,也不劳心。不需要花费体力,更不需要运用智慧和谋略:“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其四,是要远离人类社会而“游”。《大宗师》借仲尼之口评价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人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游乎无为之业”。庄子理想中的“游”显然就是这种“方外之游”。所谓“方外”,就是远离尘世,在人类社会以外。其五,是要摆脱“我”而游,要像《齐物论》中南郭子綦那样,进入“今者吾丧我”的境界,也即《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的境界。

庄子通过“体道”、“悟道”来达到“逍遥游”的精神解放,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

四、无法逃脱的悲剧与困境

面对现实的苦难世界,庄子企望在“自然”中“忘天、忘物、忘己”,求得“逍遥”,并且编织了“至德之世”的理想。然而人生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很难真正被化解掉。无论是短暂的“忘”,还是美丽的“化梦”都无法让人真正摆脱生存的悲剧。因为真正的悲剧就在于:人生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注定要失败却还要在毫无价值和意义面前进行战斗,这战斗就是悲剧,战斗者的情怀就是“悲剧精神”,就像那个西弗勒斯的神话,石头被推上去又再滚下来,如此反复不停,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但是世间总是有很多勇敢者企图超越这悲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悲壮,而庄子虽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完全摆脱悲剧的妙药,但这种探索本身就是崇高的悲壮美。

“悲剧就是一是到‘统摄’,就是人在无限和永恒面前感知到有限和渺小,短暂和虚无。”^[5]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出了古今哀叹:“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垠空之在大泽乎?”(《秋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灵魂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齐物论》)

在无限而永恒的大自然和短暂而渺小的人生之间,存在着一个使人无法承受的巨大落差,人被无情地抛掷在这个世界上,无可奈何地承受着这一切,这就是悲剧。在生与死之间,人类永远无法自由选择。而生的渺小短暂和死的在所难免,又是人类无法超越的。对死亡的恐惧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海德格尔说:“死把一切完成都超完成了,死把所有的一切限制都超限制了……人在死面前无路可走,并不是当出现了丧命这回事时才无路可走,而乃经常从根本上是无路可走的。只消人在,人就处于死之无路可走中。”^[6]因此人根本上是怕死的。凡一切不怕死的旷达思想,其实都是以死亡恐惧的先在为前提的。庄子经常想到死,谈论生死问题,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看,则庄子似乎很旷达,不怕死。他说“万物一府,死生同状”,要“以死生为一条”,又假借“空骷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透过字面意义,不难看出他说这些话的意图,恰恰在于要寻找摆脱死亡恐惧的困扰。

人从根本上说,无法逃避死亡,这就是人的“命”。庄子说“死生,命也。”(《大宗师》)。命随时随地都跟“我”在一起;“我”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个

“命”。命的根源隐藏在一种人的智力难以通达的深邃而玄秘的不可知中。“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德充符》)人无法跨越生死的局限,也无法挣脱现实命运的桎梏。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处于神射手的靶心,已“游于羿之毂中”(《德充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

庄子企图超越这神秘的“命”,也渴望跨越现实的冷酷与苦难,于是他为纷乱虚伪的现实社会幻想出一个“至德之世”。可是这种类似于桃花源般的仙境不要说在那个乱世年代,恐怕在现代社会甚至将来,人类都无法实现。庄子除了为我们幻想出一个“乌托邦”,还大胆地凭空创造出一个“至人”(或“神人”)。

庄子以丰富的幻想、汪洋恣肆的文笔、纵横磅礴的气势、优美奇瑰的意象为我们描画出一个“至人”(神人),但是庄子自己也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做到“无己”、“无待”,这终究是一场幻象。现实的苦难越沉重,人就越渴望逍遥;人越是渴望逍遥,现实的苦难也就越沉重。人有沉重的皮囊,并不能像仙人列子一样“御风而行,冷然善也”,也不能像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的心情是始于无奈而终于逍遥,但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开无奈。正是在无奈和逍遥之间,在不得已和自在之间,生活的真相才向我们呈现,庄子哲学才体现出它的厚重和深刻。

五、结 语

庄子的悲剧不是将自己沉浸在苦海中,他是将人生所有的苦难都裁剪成一袭华美的袍子,给世人留下的是五彩斑斓,而苦难却成了点缀。因此,庄子的悲剧不是凄惨暗淡的,不是颓废消极的,而是美的。庄子的悲剧是力与美的结合,这种悲剧是柔软的致命的美,是内敛而深刻的,也许正因为此,这首悲绝之音能够保持千年余载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郭庆藩,撰,王孝渔,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 胡文英,评释,《庄子独见》[M],三读斋,清乾隆(1736-1795)刻本.
- [3] 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17.
- [4] 李生龙,《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M],长沙:岳麓书社,2005:201.
- [5]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6.
- [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4.